

# 大学与美术馆

UNIVERSITY & ART MUSEUM

## 美术馆的文化策略与学科建构

★ 总第三期

经济发展、学科建设和教学质量紧密联系起来，而是把它们割裂开来了。但我很清楚：一个学校要发展，要在学术水平上提高，要在国际上获得知名度、站住脚，没有足够的校舍和学生量，尤其没有比较完整的学科结构，一切都将是空谈。虽然我把学科结构的拓展放在第一位，但是为了学科结构的拓展，为了使中央美院成为在大美术概念下全学科的美术学院，为了使她从一千多学生数扩展到三四千，也为了学院的经济能够获得良性循环，我们花了很多气力去抓硬件建设。我接任院长以后，花家地本部新的硬件建设可以分成三大块：一是建成了有1600个床位的学生宿舍，这就使得学校学生宿舍的总容纳量达到了3000人；二是2.3万平方米的设计教学楼落成，可以为中央美院最新的两大学科——设计与建筑学科提供教学空间设施的保障，而把花家地一期工程的主教学楼腾出来给造型学院和中国画学院；同时我们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美术馆，经过认真的探讨和多轮方案的设计、选择，最终委托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设计美术馆建筑。建成后的中央美术学院新美术馆，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最为现代化、国际化的美术馆，目前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美术院校的密切关注。除了花家地本部的建设之外，附中的搬迁又为大学部的教学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这个过程也是十分艰难的。首先是要让附中搬到新的校舍。因为很多教师已经从王府井搬迁一次了，在不大了解情况的条件下，他们都不愿意第二次搬动，为此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新的附中校址选在北京东部的燕郊，2005年学校花了4000万元买到了220亩土地，随之就开始修建新的校舍。燕郊校区的新校园比花家地本部还要大，为附中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理想的环境。而且，燕郊校区还有一半的校舍可以用于大学部的未来发展。在现今北京土地价格十分昂贵的情况下，很多大学都已没有继续扩大校园、校舍空间。所以今天看来，燕郊校舍土地的购买和建设为中央美院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个眼光长

---

# **大学与美术馆**

## UNIVERSITY & ART MUSEUM

---

美术馆的文化策略与学科建构

总第三期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大学与美术馆：美术馆的文化策略与学科建构 / 王璜生主编。  
一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608-4805-1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美术馆－中国－文集 IV. ①J1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8376号

## 大学与美术馆——美术馆的文化策略与学科建构

主 编	王璜生
责任编辑	那泽民
责任校对	徐春莲
整体设计	润泽书坊+刘晶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发 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200092 上海四平路1239号
网 址	www.tongji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449 000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805-1
定 价	48.00元

# 卷首语

## 美术馆的文化策略与学科建构

从国家博物馆新馆落成，到国家美术馆新馆进入设计招标阶段，以及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免费开放政策的推广，这一系列的国家政策与扶持倾向，表明了国家从行政层面上对美术馆事业的重视以及扶持力度。毫不夸张地说，美术馆迎来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尽管如此，国家整体的文化政策在其推行伊始，仍着重于基础设施层面的投入，而相对忽略了在具体文化策略上的考量。这也就对美术馆的策展人、管理者、运营者以及所有相关的从业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美术馆的文化策略，从来就不是一个恒定的标准。它是“当时的”，因应于当下艺术生态的趋向；它是“当地的”，契合于区域性的美术现象；但它又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而是一种多向共生的开放性场域，这是由美术馆本质上是一个建构性和对话性空间所决定的。因此，即便当前中国美术馆事业绕不开既定的西方模式，但仍然应看到一种本土的可能性发展空间，同时也应当看到，那些固有模式是从怎样的历史情境中，一步步发展而来的。而这样的回顾和研究，无疑会为当下自身的发展所借镜。

本期主要就“美术馆的文化策略”这个话题展开，探讨美术馆在当下语境中对其自身发展及面临困境所作出的批判与实践。并以此作为基础，衍生出对相关学科建构的思考。

在本期的文章中，S. 多伊夏尔的文章《谁之美术史？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英国策展人、学者与美术馆受众》探讨了美术史写作转型期的美术馆面临的挑战，作者通过回顾1980年代至1990年代数个代表性的策展活动，展示了新美术思潮、公众参与、市场介入等多种力量共生下策展人所作出的回应。正是这种歧向共生的论辩，为美术馆，也为美术史写作，开拓了新的可能。蔡影茜的《艺术机构的政治合理性及其批判实践》一文点明了中国“美术馆热”现象暗藏的危机，并对照西方博物馆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实践者所进行的反思与变革，指出中国的美术馆和艺术机构应意识到危机，从危机中学习，选择和构建一种能对本土语境作出反应的批判理论和实践。鲍里斯·格罗伊斯的《论新》一文，对现代博物馆的收藏机制和现当代艺术中对创新的执著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行了讨论，博物馆在文化讨论中常常被视为艺术的坟墓和创新的障碍，但文章证明了事实上正是博物馆的存在才使得现当代艺术中的创新成可能。陈平原在《大学随想》一文中对当前中国大学现状的反思，也适用于对当下美术馆行业的反思，他说，“当下中国大学，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迅速‘世界一流’的期待”，但同时他也指出，“只要把路走正，就能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何为一条“正”的路，这需要从政府到机构，从发令人到执行者都进行理智的思考。

本期中亦有对美术馆公共性、教育职能以及展示方式的探讨，卡罗尔·邓肯在《公共空间与私人利益——纽约和芝加哥的城市艺术博物馆》一文中，对包括美国大都会美术馆在内的美国艺术博物馆从私

人空间到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客观的分析，他指出，虽然这种转变是一种积极的转变，但其实，其所创造出的公共空间并不是一个平等的环境，捐赠人暗藏的“野心”、博物馆对富裕顾客的妥协，使得“公共博物馆的传统教育环境已经被繁荣局面所颠覆或取代”。这些发生在美国公共艺术博物馆发展史上的案例，为在公共性道路上大步疾走的中国美术馆行业提供警示性的思考。王春辰的《美术馆、公共教育与当代公共性》一文中探讨了美术馆与当代的艺术教育结合的多重意义，作者认为这“意味着产生并构建新的艺术文化的知识形态的可能性”，并将“赋予美术馆以多种公共性功能”。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的文章《博物馆：一种观看方式》是对博物馆展品展示与引导观众观看方式的一次有意味的探讨，作者重申了展品放置对观众所看到的东西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她看来，博物馆现在的展示方式，一方面使得“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艺术品成为我们的视觉兴趣”，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在观看一个20世纪带有雕刻的鲍勒综线滑轮得到的收获与观看一幅17世纪荷兰风景画时一样多”。文章用一些作者本人作为观看者的经历和一种中立的态度，引发读者思考：如何在博物馆中恰当处理展品所传达的文化含义，平衡博物馆观看方式带给观众的无形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版块设置上有两个变化，一是在新学科版块针对一个文化命题进行专门讨论，二是增设了典藏研究版块。新学科版块讨论的“生命政治”，是福柯对当下最有启发性的话题之一，版块内收录了我馆举办的“首届CAFAM泛主题展：超有机”系列学术活动中“生命政治”论坛上让-路易·罗卡、谢少波、张一兵、韩少功四位学者的专题演讲，以及张凯的《现代社会中的性与生命权利》一文，大家从生命政治的概念谈起，解构并深刻探讨生命政治对“批判性思想”的影响、生命政治在中国是否存在以及可否反抗、性是否是生命权力的某种策略等。在典藏研究版块，一篇整合美术馆藏品修复理论与现状探讨的《藏品保存与修复座谈会发言纪要》，一篇对藏品进行研究的黄小峰的《盛世小景：罗聘〈斗殴图〉与明清绘画中的街头暴力》，从两个角度对美术馆的收藏与研究成果作了一次展示。期冀通过这一版块，规导美术馆对藏品管理与藏品修复的重视，引发美术馆人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也启发美术史研究者从美术馆藏品提供的新材料中找到新信息。

其他版块中的文章也就美术馆的文化策略与学科建构的相关问题，吸纳了许多新的声音。有青年学者对学科建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反思，如赵炎的《文化策略、批评与价值重建——对中国当代绘画现象及艺术批评的一种反思》，刘英的《艺术博物馆公共教育的困境与心理原型的缺失》一文；也有对新概念的解读和对老概念的新说，如保罗·吉尔罗伊的《“种族”和种族学的危机》，尤西林的《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摄影的科学发展观》等文章。在研讨会版块，对2011年两个较为重要的学术活动——“乌菲齐博物馆珍藏展系列学术讲座”和“问城”论坛——进行了总结与概述。以上诸文，皆从艺术批评、美术史研究、大学思想、心理学、摄影、城市建设等多学科角度为学科建构提供了一份研究力量。

王璜生  
2012年1月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 Contents 目录

## 卷首语

美术馆的文化策略与学科建构 王璜生

Cultural Strategy and Discipline Building of Art Museum Wang Huangsheng

## 大学思想 University Philosophy

“大学” 随想 陈平原 002

Some Notes on “University” Chen Pingyuan

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 尤西林 009

The Source of Belief in Humanistic Spirit of University You Xilin

## 美术馆文化 Museum Culture

024

博物馆：一种观看方式 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

Museum – A Kind of Looking Svetlana Alpers

032

艺术机构的政治合理性及其批判实践 蔡影茜

The Political Rationality and Its Critique Practice of Art Institutions Cai Yingqian

039

公共空间与私人利益——纽约和芝加哥的城市艺术博物馆 卡罗尔·邓肯

Public Space and Private Interest Carol Duncan

059

谁之美术史：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策展人、学者与

美术馆受众 S. 多伊夏尔

Whose Art History? Curators, Academics, and the Museum Visitor in Britai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Stephen Deuchar

## 艺术史与理论 Art History and Theory

070

论“新” 鲍里斯·格罗伊斯

On the “New” Boris Groys

088

文化策略、批评与价值重建——对中国当代绘画现象及艺术批评的  
一种反思 赵炎

Cultural Strategy, Criticism and Value Re-evaluation – Reflection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Painting and Art Criticism Zhao Yan

099

“种族” 和种族学的危机 保罗·吉尔罗伊

The Crisis of “Race” and Raciology Paul Gilroy

121

作为“创伤现实主义”的波普艺术 吕旭峰

Pop Art as “Traumatic Realism” Lv Xufeng

---

## 新学科 New Disciplines

---

- 136 “生命政治”专题导言 汪民安  
Feature on “Bio-politics” Wang Min'an
- 139 生命政治的概念及其影响 让·路易·罗卡  
The Concept of Bio-politics and Its Influence Jean-Louis Rocca
- 144 从他处看世界：民主的解构与召唤 谢少波  
Looking at the World from Other Side: The De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and Summon Xie Shaobo
- 154 生命政治的宰制和抵抗 张一兵  
The Domination of Bio-politics Zhang Yibing
- 162 我们欲望着他者的欲望 韩少功  
We Desire at the Desire of Others Han Shaogong
- 167 现代社会中的性与生命权力 张凯  
The Sexuality and Life Power of Modern Society Zhang Kai

---

## 公共与教育 Public and Education

---

- 182 美术馆与当代公共性 王春辰  
Art Museum and Contemporary Publicness Wang Chunchen
- 189 艺术博物馆公共教育的困境与心理原型的缺失 刘英  
The Plight of Art Museum Public Education and The Loss of Psychological Archetype Liu Ying
- 194 摄影的科学发展观：关于“原作 100”的对话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of Photography: Dialogues on "100 Vintage Prints"

---

## 典藏研究 Symposia

---

- 204 态度与方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品修复展”藏品保存与修复座谈会发言  
纪要  
Attitude and Method — Minutes of "Colloquium on Coll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CAFAM"
- 214 盛世小景：罗聘《斗殴图》与明清绘画中的街头暴力 黄小峰  
Unsignificant scene of the Great Ages Huang Xiaofeng

---

## 研讨会 Symposia and Forums

---

- 230 “乌菲齐博物馆珍藏展系列学术讲座”综述  
Summary of "Lectures on The Collection Exhibition from Uffizi Museum in CAFAM"
- 250 “问城”论坛纪要  
Summary of Speeches at "City" Forum
- 281 编后记

---

---

---

# UNIVERSITY PHILOSOPHY

---

---

---

---

---

---

## 大学思想

---

## “大学” 随想

陈平原 文

记得毛泽东说过，屁股决定脑袋。这是有道理的。有时是利益与立场，有时是眼界与学识——校长与教授各有各的主体性，也各有各的洞见与不见。我不是教育部长，也没当过大学校长，只能站在一个教授——而且是“人文学者”的立场，谈论我所知道的“中国大学”。因此，所论既不同于官员、校长，也不同于记者、网民，还不同于“专业有专攻”的教育学专家。

我关注的是“中国问题”，偶尔牵涉某国外大学，只是引以为证，没有专门研究；喜欢古今对话，强调理解传统书院以及百年中国大学进程，则反感动辄“与国际接轨”的高人；欣赏胡适的“建设者的姿态”，因此懂得换位思考，关注理想性与可行性的协调。

十八年间，先后刊行《老北大的故事》(1998)、《北大精神及其他》(2000)、《中国大学十讲》(2002)、《大学何为》(2006)、《大学有精神》(2009)、《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2009)、《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011)等著作，我几乎从一个“文学史家”变成了“大学史家”。别看二者只有一字之差，很容易“形近而讹”；可我心里很清楚，自家论述“不够专业”。我所擅长的，仅仅是在学术史、思想史及文学史的视野中讨论中国的“大学”问题，故别有幽怀，也另有洞天。

## 二

在全球视野中，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中国确实已经“举足轻重”；可学问上则未必。这里有科研体制缺陷，有自家努力不够等原因，也有语言问题(英语占主导地位)。我感叹的是，中国大学在国外的排名迅速提升(因主要看各种数字)，但在国内政治生活及文化建

设上的重要性反而在下降。

为什么？因为，当下中国，大学不再神圣，公众缺少敬畏之心；大学及教授的独立性在减少，或依附政府，或背靠商家，或追随传媒；大众传媒的崛起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导致知识传播途径发生很大变化。因此，中国的大学及大学校长，普遍有理想，有钱财，也有机遇，但前路漫漫，不见得一定能做好。相对于制度完善且处在平台期的国外大学，我们机会很大，但底子太薄。很多国外著名大学校长谈及中国大学，一片喝彩声，尽给我们戴高帽，那很大程度是为了给自己争取经费，培养各自国民的“危机意识”。

以教师为例，能在美国著名大学当副教授的，回到北大、清华，可以给教授的位子。至于国内其他大学，在美国做过两年博士后，回国后直升正教授，而不必从讲师(助理教授)做起的，比比皆是。

北大这些年努力筹集经费，从全世界招聘“讲席教授”。原以为很容易，结果却不太理想。因除了薪水，人家更多考虑整体的学术环境及制度建设。而且，我有点担心，这种“远来和尚好念经”的思路，会导致国内一流人才流失。

### 三

谈论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乃至经济、政治等，都必须考虑最近十年的“大学扩招”。具体进程不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0%已经涨到26.5%，2010年高校在学总规模3105万，无论本科生还是博士生，都是世界第一。大学如此迅速膨胀，政治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文学者自有不同的立场及判断，因这牵涉教学水平、学术风气，以及大学生就业等一系列问题。我更关注的是，这一“跨越式发展”背后的教育理念。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本来就不一样，评价此“学术大跃进”之是与非，端看两种可能性——到底是广种薄收呢，还是劣币驱逐良币。以我比较熟悉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例，2010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大约1250名(文艺学17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120，汉语言文字学153，中国古文献学60，中国古代文学229，中国现当代文学167，少数民族

语言及文学 5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00……还有按一级学科授予学位 133)。中文学科底子比较厚，还算不太冒进；很多“当红学科”，步子迈得更大。

在我看来，在中国办大学，办大容易，办小难。没人安于“虽好犹小，虽小犹好”的大学——中国至今没有像美国那样优秀的文理学院。为什么？关键是大学排名以及行政干预，当然，还有校长们的虚荣心——你愿意指挥“十万大军”呢，还是想当千人的“小头领”？校长如此，院长(系主任)也不例外。

#### 四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扩招”是好事。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过分倚重行政力量，导致有关部门产生错觉，以为真的无所不能。数量是上来了，面子好看了，步调也勉强一致，可对于教育内在的伤害，很长时间缓不过来。

从大学扩招的政府决策，到教育部推行各种评鉴，到酝酿统编教材与研究生统一考试，再到开会时主席台上排座次，你我都明白，行政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2011 年 5 月参加山东大学会议，主席台中间端坐着的而且第一个介绍的是教育部社科司出版处处长，而后才是山大校长、山东省教育厅厅长。1992 年参加河南大学“19—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讨论会，教育部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处长坐中间，会议主人、93 岁高龄的任访秋教授坐在长长的主席台的最边角上，那时我年轻气盛，当即离场。事后我问那处长，你怎么坐得住；人家很尴尬，说没办法，这是河南大学的安排，不容他推托。真没想到，20 年过去了，中国还是这个样子。我问山大，回答是惯例，他虽只是处长，可一发言，就代表了教育部。我问：要是来了个全国人大或国务院的科长，你们也必须奉若上宾？这样办大学，这样开学术会议，难怪没长进。

我这才明白，中央机关的大小领导，为何喜欢到各省市县考察工作。即便你心里不以为然，起码这仪式，这毕恭毕敬的姿态，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教育——当大学生将考公务员作为第一选

择时，这个时代肯定是有毛病，还能期待出一流的科学家或哲学家、文学家？

## 五

办大学，借鉴国外容易，坚守自家特点反而更难。我在《走向国际，不代表迈向一流》（《人民日报》2011年6月13日）中称：“改革开放三十年，今日中国学界，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

大学无法像工厂一样，引进整套设备；即便引进，组装起来后，很容易不接地气，功败垂成。有几个认识上的误区，需要提醒。

第一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与国际接轨”。请问哪个“轨”，怎么“接”？认真学习可以（也应该），但“接轨说”误尽苍生。某大学校长主持汉学家大会，说“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初听此言，啼笑皆非——本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岂能同日而语！不过，这位校长并不美丽的“误会”，倒是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举个例子，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奖励用英文发表论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教授时，格外看好欧美名牌大学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员，更是唯哈佛、耶鲁等马首是瞻。

第二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强强联手”。当初听说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是强强联手，因为，各种数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亏还没把北大、清华合起来——据说有妄人提这样的建议。大学合并，有好有坏，但“强强”很难“联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遗症。过多的内耗，导致合并后的“大大学”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来调整、消化。需要的话，强弱合并还可行。因为，大学需要有主导风格，若强强合并，凡事都争抢固然不好，凡事都谦让也不行。

第三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取长补短”。办大学，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要努力开拓视野，多方借鉴；但因为有各种评估及排名，这个“取长补短”的过程，很容易演变成缺什么（专业）补什么（专业），最后导致泯灭自家特色。比起20世纪30年代、50年代，今天中国大学的最大“特色”，就是没有特色。

第四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努力“适应市场需要”。学生选择专业，有其盲目性，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无论请进来还是送出去，都应该考虑国家需要——凡市场能解决的，不要再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就业前景好的商学院或法学院。这实在不应该。欧美也是这样，政府或大学的奖学金，不是奖励选择热门专业，而是用来调节社会需求的。你学古希腊的哲学或文学，就业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奖励你。同样道理，用国家经费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应该有专业方面的要求。

第五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多跟国外大学签合作协议。很多协议是空头支票，没有任何用处。“互派学生”是好事，但得有经济实力支撑。北大中文系十分“矜持”，一是有自信，愿意保守自家根基，很不喜欢那些故意自贬以讨好外国教授的说法；二是因学生自己出钱，自费到国外游学一年半载，贫穷子弟做不到，很容易引起同学间的攀比。现在很多大学招聘教师，最好是外国著名大学拿学位，其次也得外出游荡一两年；歧视纯粹的“国货”，可见对自家的教育与学术没信心。

## 六

在《大学三问》(2003)中，我谈及“管理不是万能的”；当了几年系主任，明白其中的难处，于是添了一句：没有管理，那也是万万不能的。以北大教授为例，四分之一不用催，四分之一催了没用；四分之二可上可下，如何调动这部分学者的积极性，就是“管理”发挥作用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比今天清净多了，因没有那么多诱惑。当下的中国大学，无论工作时间还是经济收入，都是“专业”太少，而“业余”太多。最好是增加薪水，减少折腾，让大学校园重归平静，让教授们一心教书治学。香港的大学教授薪水高，但除了薪水，没有任何灰色收入；你若外出演讲，拿钱的，还得跟学校分成。至于开国际会议，只能在校内餐厅吃饭，且不得饮酒，因不是生活必需。全世界的学者都知道，在中国开会，好吃好住，还可以游山玩水，最舒服。

这其实挺可悲的。

所谓“折腾”，包括过多的奖励——这也是导致大学校园骚动不安的重要原因。学者不是为了获奖而教书、治学，但对于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确实应该给予重奖。我的建议是：少评奖，评大奖，甚至就评终身成就奖。目前这种过于频繁的评奖——每年都评，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获各种名目的奖励，徒然制造许多矛盾。因为，三分之一的教师获奖，意味着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得到。至于很多大学明码标价，奖励发表学术论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绝对不是好主意。这么做，是有效果，但学者尊严何在？

我写《学问不是评出来的》（《人民日报》2007年7月6日），谈大学问、大教授都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评”出来的。做学问，不是对抗赛，而是表演赛。若是前者，十个八个对决，矮个子里总能拔出高个子来——目前各大学评职称就是这么做的。至于后者，要求每个人尽情发挥，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才华。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可这些成果有多大意义？过多的奖励，效应递减，且鼓励钻营吹牛；谁人获奖，靠数论文篇数固然不行，靠学术委员会投票就公正？都说以“学术”为重，可同样是教授，有洞见，也有偏见、歧见。目前中国大学，没能建立起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有此理念，但制度及执行力跟不上。此外，明知“外部评价”很重要，但受制于以下三者：选择恰当的评鉴者、保密到家、必要的操作成本。

## 七

清华百年庆典，气势非凡，《新京报》记者问我，您最想对清华说什么？我回答：办大学，可以提目标，但不能太把目标当真。今日中国大学，普遍雄心壮志有余，脚踏实地不足。清华不一样，历来以认真实干见长。悠着点，一直往前走，会有锦绣前程的（《既有国际视野，也讲本土情怀》，《新京报》2011年4月23日）。

这既是给清华的建议，也是给所有中国大学提醒。目前，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快马加鞭”；可请大家记住，“五四运动”中蔡元培离开北大时留言：“杀君马者道旁儿。”其实，五年前我就曾撰文，引

马玉涛的成名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作为标题。可惜文章发表时，被裁成好几段，穿插进各种问答中（参见 2006 年 12 月 27 日《国际先驱导报》）。为何需要“慢些走”，并非像那歌里唱的，“要把这迷人的壮丽的景色看个够”，而是担心跑得太快，步伐不稳，那样会摔跤的。暂时停下来，或者放慢脚步，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反省、调整步伐。

大学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与“大国崛起”互为因果、互为表里。也就是说，跟经济水平及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但不等于 GDP；除了政治及文化等软实力，还事关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杜维明教授问我：中国大学何时能在世界舞台上“轻松自如”地表演——即便不是唱主角，但也不能总是跑龙套呀。我说 10 年至 20 年。他很高兴，说这是他听到的最乐观的回答。不少人说需要 50 年，也有说一个世纪的，让他很郁闷。

我举例：10 年前，某德国汉学教授说他从不买中国学者写的书；10 年后，他开始有选择地阅读中国学者的著作。再过 10 年，我相信，在各个学术领域里，愿意认真倾听中国学者的意见的，会越来越多。

站在大学教授以及知识分子立场，我对当前中国大学之“急起直追”，有诸多批评与反省；但并不否认其取得巨大进步，也欣赏其勃勃生机。当下中国大学，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迅速“世界一流”的期待，但只要把路走正，就能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2011 年 8 月 24 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

尤西林 文

—

大学的诞生，是一桩现代性事件。今日朝野均慨叹中国大学精神的失落，其实，对于正在争取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大学精神本身也属于有待建设的目标，它与中国现代化互动关联。所以，严格讲，中国大学百年来起伏变迁，虽然曾有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这样的大学精神氤氲时期，也有最为不堪的今日大学，但是，中国从来缺少大学精神，因而需要接受关于大学精神的启蒙。

近现代意义的大学，自 12 世纪初诞生至今，甩开诸多外在形态改变，就其最为根本的精神宗旨所规定的大势而言，可以区分为两大演变阶段：以 19 世纪德国柏林大学建立为标志，此前的大学基本以基督教神学修道院为原型而向世俗化方向演变，此后的大学则愈渐定位于民族国家精神文化与科技所需求的教育并科研。

这一变更更具体的情况是：中古大学不仅脱胎于基督教会，而且不管如何趋于世俗化，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团体，特别是一个普世的基督教精神世界，始终是大学的实质性依托。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世俗化迄至 18 世纪也未能提供一种取代基督教世界的依托体。这一情况随着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近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观念而根本转变。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观念终于成为迄今现代人类社会最为坚硬的统一体单位。正是承续赫尔德(J.G.von Herder)的“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在普法战争惨败时刻，德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自我意识被有力激发，它不仅体现为费希特(J.G.Fichte)著名的《告日耳曼国民书》(1806)，而且推动了洪堡(W.von Humboldt)上书申请创办柏林大学(1809)。

柏林大学的成立，与汲取战败教训、强盛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背景

密切相关。柏林大学为此后的大学开创了一个深远的转变方向，那就是，将科学的研究视为与大学传统教学并重的职能。这一方向固然可激活教学传统而成为现代大学重要的特性，但以研究为方向却成为大学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特别是转化为商业经济的纽带。这一纽带对于大学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大学回应社会以激发活力的途径，又包含有使大学隶属于现代化技术进程，从而丧失大学本已的现代性批判位置的危险。海德格尔(M.Heidegger)后来从后一角度反思了它更为深远的危害：

一种以研究所方式活动的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比它自己的还处于单纯博学中的人文科学院系里的学科，更接近于相应地建立起来的物理学研究。所以，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人。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学识，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

研究者必然自发地涌向根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的本质形态的范围中。……除此之外，还有某些时间和某些地方，能够保持着变得越来越淡薄和空洞的学究和大学的罗曼蒂克。但是，大学的有效的统一特性，以及大学的现实性，却不在科学的原始统一过程所具有的某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发源于大学，因为它得到大学的培育，并且在大学中得到了保存。<sup>1</sup>

海德格尔在此反思中把作为现代化及现代性思维典范的科学归源于大学。但是，大学这种涵摄并超越现代性的本源地位又起源于何处呢？

这是有关大学本质的根本问题。与现代关于大学(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毕业生就业去向等急迫重大而具体应对性的现实问题相比，关于大学本质的超迈反思形成了另一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值得注意

<sup>1</sup>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孙周兴译，《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4页。引文将原中译文中“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一词按照其学术思想史含义改译(意译)为更为通行的“人文科学”；原中译文中“学院”一词其文化雅用含义(学院、经院)颇传神韵，但汉语“学院”一词流行指称是指低于“大学”的建制，鉴于本文恢复“大学”本义题旨，故改译为“大学”。